

暨南大学丛书

# 明代中晚期 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

徐 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明代中晚期 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

傅 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暨南史学丛书

# 明代中晚期 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

徐 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徐林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6

(暨南史学丛书)

ISBN 7 - 5325 - 4460 - 5

I. 明... II. 徐... III. 知识分子—人间交往—研究—中国—明代 IV. D69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2812 号

暨南史学丛书

**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

徐 林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75,000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7 - 5325 - 4460 - 5

K · 881 定价: 2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前与承印公司联系

**徐林** 1972年生，辽宁阜新人，200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近年来在《史学集刊》、《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并参与和主持多项省市级科研项目，目前正在主持广州市“十五”规划课题“明代中晚期广州士人社会生活研究”，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岭南区域社会史相结合。

# 暨南史学丛书

## 第一辑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

——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

广东会馆论稿

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

中国古代史论集（第二集）

暨南史學

蓬堂題前



本丛书由  
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项目经费  
资助出版

## 总 序

广东属禹域极南之地,自昔为海上交通枢纽。汉代合浦徐闻即为往印度洋航路出口障塞,《汉书·地理志》记之详矣。暨南大学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取《禹贡》“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为名,用意至深。故魁然为侨校之首。创校以来,一贯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世界先进文化为职志,于推动历史研究,更不遗余力,早在1928年即有历史学系之创设。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执教之名历史家先后崛起岭表,何炳松之于史学理论,周予同之于经学史,丁山之于商周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均树立风声,为暨大史学奠定扎实研究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教学重点之扶持,史学队伍更为坚强活跃,陈序经、陈乐素、朱杰勤、金应熙辈,于宋史探索之深入,东南亚史、华侨史、港澳研究诸领域之开拓,蔚为重镇,于史学界中更别开生面。

近时暨大计划出版一系列“暨南史学丛书”,除刊布专著,并辑录近几年来暨大学人在国内外发表有代表性之论著,系中同仁来书要我写一序言。暨大在史学园地的成就,因地缘关系,特别朝向中外与港澳之关联及岭南人文活动等主题,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自有它的特色与传统。至于新的课题,若“南海神庙之历史”及“阿剌伯人与南海船”等专门研究,尚待推进,为岭南文化史填

补缺口,正是大家迫切期待的工作。港澳地区之历史学由于暨大史学研究工作成果之带动,彼此之间唇齿相依,更能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自不待言。因不辞弃陋,欣然而乐为之序。

饶宗颐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 非是无心近红紫 清贫何地著繁华

明代中晚期是天崩地解独具魅力的变革时代，江南是明代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的财富之区，江南士人精英荟萃独领风骚。研究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天地人三才兼备，是个独具学术慧眼且应该趣味横生的选题。此选题应属于方兴未艾的社会史范畴，具体而言，又当属于社会生活史方向。美国学者彼德·布劳曾说：“谈论社会生活，就是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人是社会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虽可区分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但均属社会生活范畴，当不容质疑。

有关明代士人的研究，最近十余年间，颇受关注，论著丰厚，成果令人瞩目。

就著作而言，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中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通过对中国古代“士”、“商”关系变化的梳理，揭示宋代以降，尤其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人群体的心路演变历程。北京大学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是近年来有关明代士人研究的力作。作者站在学术思想史的高度，通过解读明清之际“遗民”生活方式，揭示“遗民社

会”的深刻内涵以及“遗民学术”对知识界(士人阶层)的潜在影响。左东岭先生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周明初先生的《晚明士人心态与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则从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了明代社会变迁与士人文化心态的流变。台湾陈万益先生的《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市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则通过对晚明“性灵”文学的解析,阐述明末士人文化生活形态的演变。陈宝良先生的《中国的社与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部影响很大的社会史学术佳作,作者从社会史角度对历史上“社”与“会”进行分类研究,其中对明代士人组成的政治性会社、文化生活性会社,包括诗文社、讲学会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刘晓东先生的《明代士人生态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以独特的视角对明代中下层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索和总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研究明代士人问题的文章日渐增多,使人无力通览。李洵先生撰写的《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史学集刊》1984年4期)和《说卢柟之狱》(《史学集刊》1994年3期),探讨了明代江南士大夫阶层政治态度的转变与江南地方势力的兴衰以及士人的社会地位和际遇出路问题。周学军先生《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3年1期),从知识分子发展史的角度探讨晚明东林党、复社以及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群体的政治生活变化及其社会意义。陈宝良先生《论晚明的士大夫》(《齐鲁学刊》1991年2期)则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论述晚明士大夫阶层在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等方面的变化及其不同于前代的生活特点。夏威夷先生《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关系》(《社会科学》1993年3期)、陈大康先生《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

关系之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1期),通过对士、商关系变化的考察,论述明代中叶后士人风气、特征及其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赵轶峰先生《山人与晚明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1期)一文称,晚明社会有部分士人宣称出家为释道,却不在寺观,而是出入通都,游走公卿,这是脱离传统儒家道路的另类生活选择,引发了士人飘逸闲适的文风的出现。

上述论著从不同的视域以不同的方法对明代士人群体进行研究,对本书作者研究思路多有启发。然则上述研究多侧重于思想和政治层面,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对明代中晚期士人社会生活史的全面研究尚嫌较少。明代中晚期社会经济领域和思想意识层面的巨大变迁交互发生并形成一种巨大冲击,引发了士人群体心态、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构建了这一时期的不同于前代的特殊的社会交往行为和交往心态。在此前提之下,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的社会交往原则、交往方式、交往媒介、交往范围、交往对象都有新的变化。作者正是力图通过对外在的社会交往的研究探讨,进而揭示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阶层的心路变迁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对这样课题的研究尝试是极有意义,应予鼓励的。

徐林先生是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与我有师友之谊。徐林同学早年游学东北师范大学,专攻明清史。我当时供职于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关于明清史研究,我们多有交流。2002年,徐林同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南下受聘执教于暨南大学,这时我已奉调羊城,我们之间的学术切磋便自然地多了起来。徐林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此选题基本契合,但今天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学术专著与当年的学位论文却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很难寻觅当年的踪迹了。文章的框架结构较当年更加条理更加清晰了,逻辑

推理更加严谨了,好多认识较当年更加深刻,甚至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他毕业5年来不断思考、探索、充实、修订,不懈努力勤奋工作的结果,读着这部学术专著,作为师友的我,心中充满快慰,一位史学新人长大了!

《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分引言、一、二、三、四、五章共6部分,约16余万字。

第一章“处于悖论中的中晚明士人”,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提炼、编排、诠释,给读者构画了“躁动”与“舒张”并存的晚明江南社会的独特历史长卷,交待了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特定历史时空。紧接着作者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探讨了中晚明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趋同与背离。背离有二,其一为“嘉靖以后,从王氏(阳明)而诋朱子者接踵于人间”。其二为“尊二氏(释道)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化、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恣论为神奇,以荡弃行检扫灭是非廉耻为广大”。这一时期,士人不仅在行为而且在思想上确有巨大改变。在谋食与谋道关系上,陈确公然主张“治生尤切于读书”。在个性张扬上,李贽则公开宣称“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这都是前所未闻的背离儒家思想传统的公开宣示。于是,一些士人放弃传统儒家为其设计的读圣贤书,走科第路,猎取功名,博得紫袍金带,光宗耀祖,显亲扬名,功荫后世的最终人生目标和生活目的,或步入商海,或混迹市井,或参禅悟道,或放浪形骸,追求一种闲适飘逸旷达的现实人生意境。士人的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游历山川、吟风赏月、谈禅访道、饮酒品茗,有的士人将人的欲望无限张扬扩大,将生活夸张为放纵怪诞、颓然自放、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狂歌豪饮,甚或千

金买笑,不以为非,反标榜为名士风流。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在极尽自我欢愉和个性舒张的同时,内心深处仍然笼罩凄苦的困惑和郁闷的哀愁。为何困惑?为何哀愁?徐林同学的回答是,明代中晚期政治黑暗、仕途壅滞、传统儒家观念遭到空前的挑战,一些自恃看透红尘、勘破功名的士人,在心灵深处仍然割舍不去功名利禄、兼济天下的情结。像官场屡蹶、被下诏狱,自命狂士的风流才子唐寅仍在发愤“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第一章的精采之处远不止于此,细细把读,处处都有思想火花与灵魂振动。

第二章“声景比附 燕集唱酬”,专题讨论明代江南士人群体内部及士人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其中第一节“士人结社”、“士人游历与讲学”、“宴饮与士人社会交往”、“煮水品茗与士人社会交往”四部分,讨论士人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第二节由“隐士与山人的社会交游”、“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三部分构成,分别对典型几类士人的社会交往进行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剖析。

第三章“明中晚期士人社会交往的下移”,所谓“下移”,即士人走出惺惺相惜小的社交圈,与商人、妓女、市井之徒进行交往,“下移”完全可由“世俗化”取代。其中第一节“士商相混 蝇聚一膻”分“士商相混与士商互识”、“士商相交”、“士商交往之文化解构”三部分,讨论士人商人相互交往及文化史根源。第二节“选艳征歌 狎妓冶游”由“士人与江南妓业的兴盛”、“士妓相亲”、“士妓相惜之时代悲剧”三个标题组成,讨论了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与妓女的社会交往。第三节则探讨了士人与市井之徒的交谊。

第四章“焚香煮茗 共谈空寂”,作者在章下不设节,直接以“明中晚期三教合流及世俗化”、“士人与僧道交往状况”、“士人与僧道交结之文化诠释”三个标题展开叙述,着重讨论明代中晚期

江南士人与释道二氏的社会交往及文化诱因。

第五章“明中晚期士人社会交往与文化”，分“士人社会职能与中晚明士人的没落”、“中晚明士人文化人格的彰显与社会交往”、“士人身份与社会交往中的文化心态”三部分，重点探讨晚中明江南士人在社会交往中所体现的文化符号和所显示的文化人格。

在本书第二、第三、第四章中，“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士商交往之文化解构”、“士妓相惜之时代悲剧”及“士人与僧道交结之文化诠释”等均倾注了作者极大的创作热情，资料翔赡，论断新颖，创意叠出，表现了作者的文史研究功力。第五章中“士人身份与社会交往中的文化心态”部分亦精采纷呈，值得品味。

自从人结成社会组织以来，社会中所有的人和物以及不可见的精神都不再是完全意义的自然存在，都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士人阶层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之处就在于其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人，其言行举止都体现着文化特征，成为儒家文化的符号象征。中晚明时期江南士人功名意识淡化以后，其文化意识却没淡化，不仅重视传统的文章诗作，而且到儒学之外寻求文化营养，参禅悟道风行，创作也走向多样化且与社会交往的多样化并行，但这些仍无法排遣胸中郁结，追求频繁的社会交往，以期弥合与传统社会的裂痕。在现代社会中，判定人的社会地位，往往考虑财富、权力、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等要素，而在传统古代等级社会中，人所处的社会等级却是不能忽略的最关键因素。作为古代四民之首的士人，享有一定数额的免役经济特权；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作为各级官僚预备队的士人，自然受到世人的高看。虽然通过科举猎取功名者，属于凤毛麟角，可是士人仍受到普遍的尊重。在明代中晚期，虽然“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金钱拜物教侵蚀着社会各个领

域,受其影响,士人中确有绝意仕途或兼营工商却不放弃士子身份者,究其原委就在于舍弃不掉这份“尊重”。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群体中出现的弃巾风,并非士人从政治中游离出来的自觉选择,而是因科第无望,此路不通时,不得不暂时搁置功名的无奈。

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的社会交往活动频繁,形式多样。在这多重社会交往中,绝大多数士人寻求的是个人或群体的身份确认,不仅是他人的确认也包括社会的确认。一些士人极尽花样的个性张扬甚至放浪怪诞的行径具有刻意表演的性质。中晚明士人的社会交往目的何在?“儒为名高,贾为利厚”,乃人之常情。中国传统古代社会的士人,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是在以知识求声名,以声名求地位,这是士人的核心利益追求。士人声名之高下,一方面取决于其文化知识的多寡与创新能力之强弱,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传统古代社会士人而言,“名以才出”的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是至关重要的,完成转化的唯一渠道就是社会交往。在这层意义上讲,李贽所说的“天下尽市道之交”,“其交也不过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不无道理的。所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也就成了士人社会交往活动中的潜在利益需求。无论是士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士人与士大夫的交往,士人与商人的交往,士人与妓女的交往,士人与释道的交往,概莫能外。明代中晚期士人“纵适游讨”是对传统社会中交往“利益”纽带的高度开启,“追名逐利”几乎成为士人社会交往的唯一目的。“纵适游讨”通过攀援与依附来获取声名利益,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士人自身人格沦丧自不待言,而在与更高阶层(公卿权贵)社会群体的交往中,其所扮演的往往是并不持有利益权力的依附者或捐客角色。只有极少数“狂狷自现”式士人的社会交往体现着士人自我意识与个性自觉的极度高扬,这其中虽有不合理的因素